

# 彝族氏族部落史

王田英书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 彝族氏族部落史

杨风江（彝）译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

62222

## 彝族氏族部落史

杨凤江 译注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5,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 7-222-00686-9/K·121 定价: 3.50 元

## 内 容 提 要

彝文古籍《彝族氏族部落史》原系乌蒙彝文，源出云南武定县，建国前由北京图书馆珍藏，乃海内外现存彝文古籍珍本。

本书为诗体五千行，内容叙述彝族远古先民采集、狩猎、粗耕等生产生活及氏族部落战争情景。全书共十章，记载了69个氏族部落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古代社会、原始宗教、哲学、风俗、地理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武定县西北境与元谋县比邻。而元谋县‘东方人’和人猿超科头骨的发现，则填补了人类进化中的两大缺环，为人类起源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提供了珍贵的关键性实物证据。它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人类研究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彝文古籍《彝族氏族部落史》所记载的彝族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情景，在科学研究上就更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由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族研究人员、武定县人杨凤江译注。译注工作做得十分认真细密，其中不乏独到的学术见解。

##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 总 序

### ——英姿飒爽的“山野妙龄女郎”群

刘尧汉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乌蒙山和云南的六诏山（乌蒙山脉的分支）、哀牢山、蒙乐山；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就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境濒临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元谋县。彝族是我国滇、川、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或古氏羌）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迁往西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这便很自然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同样可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维族）、吕振羽四大史家，一致认为，如果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写好中国通史。目前尚健在的史家白寿彝同志（回族）所写巨著《中国通史》，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如果依旧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的写法上，尽管具有如上所述的正确观点而无具体的新内容，要写出一部包括各族新资料的中国通史，只是空话罢了。所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根据家乡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哀牢山沙坦兰等彝村（简称沙村）的实地调查资料，经初步整理，写出题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一份手稿（1955年5月）。这份手稿，是我于1945年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念书时，以在系主任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写的毕业论文《沙村社区研究》初稿为基础，逐步增补修改而成。

### 一、首次出场的“山野妙龄女郎”

沙村地主刘宇清（1830—1890）在其高祖刘楷（普楷）墓碑上撰写具有诫谕子孙性质的一篇碑文和剥削租簿之首附有其《诫谕诸儿侄》一文，这两篇文献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1368—1911）的沙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兹全录于下：

#### （一）在碑额“高祖刘公讳楷老大人之墓”<sup>①</sup>的碑文中

---

① 刘楷（即普楷）之墓原在原属沙村波罗庄的塔枝树村，清咸同之前，其子孙栽培这一宗支也住塔枝树。到他的玄孙刘宇清因协助清朝镇压本山区彝族革命运动有“功”，夺回栽培所出卖的沙坦兰庄，便全家迁往该庄大村，同时将他的墓一并迁至沙坦兰马鞍山村旁的马鞍山山岗上，并为之立碑撰文。该文系我于1945年就在该地作实地调查时，得马鞍山村彝族农民鲁师宏引往墓地抄录。

说：

“南山<sup>①</sup>中，林木茂，野兽多。我远祖，农耕少，猎事多，率奴众，逐禽兽，朝夕乐；邻侵界，必战斗。当是时，夏衣麻，冬衣皮，朝食莽，晚食肉，得温饱。明洪武，土头薄，播种一，获八、九；自此后，农事繁，猎事少，居住定，不再流。楷高祖，天顺时，土头沃，种一升，获二斗。楷祖时，嘉靖年，开沟渠，稻谷熟。高祖楷，集街兴，商贾出，带银两，购皮物。楷力强，善射猎，力敌百，人莫侮。我曾祖，是赌徒，输庄业，不可赎，白龙庄、改板山、波罗庄、阿底本，是我土，沙坦兰，白龙庄，输商贾。咸、同乱，我建功，沾圣恩，沙坦兰，得返主，我后辈，宜保土。楷父体，火化后，<sup>②</sup>无着落，楷遗体，原葬处，塔枝树，地不利，乖事出。移此后，龙脉旺，万事昌，南山强，惟我庄。

玄孙字清跪撰

大清光绪三年（丁丑，1877）三月立

（二）在《诫谕诸儿侄》<sup>③</sup>文中说：

谕诸儿侄：溯我高祖楷，曾于崇祯驾崩年，一次酷戮庄奴六人，家奴二人，遂招致摩哈苴庄群起暴叛，楷父因是横死，

---

① 南山——哀牢山脉上段属巍山（蒙化）、弥渡、南华（镇南）、楚雄、双柏五县相连的区域，在该五县习惯上，统称之为南山，因其在该五县之南，故称。

② 彝俗火葬，普氏系彝族，故行火葬。哀牢山彝族在十多代前还行火葬，晚近荒野中还常发现火葬后盛尸灰的土罐，现已不行火葬；而凉山彝族现仍行火葬。

③ 附载这篇遗文的陈年祖簿，系刘字清之幼子芳圃保存，笔者于1949年调查时抄录。

乃将原有谷租五十担，包谷租五十担，莽租八十担，折为不值半数之租银六十两<sup>①</sup>，并免耕役，始息争乱。复远溯楷之高祖时，蓄奴数百，分住低屋，鞭策耕作，耕不勤，织不力，猎不中，战不勇；鞭之急则叛，不鞭则耕猎不敷其所食。遂散奴于村闾，授土地，给锄犁，予牛羊，令其成偶，各事家业；其耕猎，半为主，半为己；若是，始勤于耕猎，半为主耕之所获，多于专为主耕之时。迨至楷祖时，半为主耕之所获，不如为己耕之半；遂散其地于庄奴，始令辟田种稻，课租五甍，及我曾祖辈，赌输庄业之半。迄咸、同，全山夷变；迨乱平，为抚夷计，我族减租一甍半，以杜乱源，殷鉴在前，尔等宜善保庄业。此谕，父伯字清，光绪戊子（十四年，1888），三月初五日。

我把包括这两篇文献在内的手稿，寄请范文澜先生审阅。我和范老从未面识，他却热情地为拙稿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刊上，将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他在这篇介绍文字里说：

近来看到刘尧汉同志所著《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

刘尧汉先生在前言里说：“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调查从1945年起到1953年为止，历时十年，作过四次调查，最后一次1953年。……所根据的

---

① 该项租银，有时也可用铜质制钱代替，曾折为当时“崇禎制钱”十二万文，直到解放前十年，刘字清的十个儿子和四个侄子家里，每年元旦，皆在供桌上横陈着五千文的一串崇禎制钱，就是其祖上剥削摩哈直庄的农民所积留下来的。

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

（范老此文中摘引了拙稿所录沙村刘宇清两文，见前引不赘）

我这份手稿再经加工，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不久，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亚农在其所著《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一书里，为阐述周宣王（前827——前782）进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改革，引用了刘宇清两文。李亚农说：

西周的奴隶制已经发展到了最后关头，周宣王的政治改革乃势所必至。

我们知道周宣王是周代的英明的中兴之主，毫无问题，他老早就看到了当时的奴隶生产已经无利可图，才采取了改革的措施；尽管有不少糊涂的奴隶主在反对他的改革，但他还是坚定的贯彻了他的改革政策。凡是有远见的、精于盘算的奴隶主都会采取同样措施的。云南哀牢山

沙村的彝族奴隶主。留下来的宝贵无比的两篇文献，便是最好的实例。

第一篇文献。“高祖刘公讳楷老大人之墓”的碑文说：（已见前，此处略）

第二篇文献。收租簿之首，附有《诫谕诸儿侄》一文说：（略）

这位刘宇清先生简直是一位伟大的史家，起码比那些下笔动辄就是数十万言，还说不清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的转化过程的史家要伟大得多；他这两篇总结过去经验，藉以告诫子孙的文章，简明而又明确地叙述了沙村将近五个半世纪（明、清两代）的阶级斗争史及由奴隶制而封建制的转化过程。<sup>①</sup>

当年范老撰文介绍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其用意在于鼓励青年做研究工作，不宜只停留在书本上兜圈子，还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实地调查，寻觅现存的活史料，以补书本之不足。范老的勉励，一直鼓舞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道路。倏忽三十年，我已年逾花甲。所幸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近年来我带领彝族男女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滇、川、黔三省山谷间，曾大雨淋漓乘骑入哀牢山，顶烈日爬鲁魁山（属六诏山脉），冰天雪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往来于川、滇大小凉山，为的就是寻访“山野妙龄女郎”。至今“山野女郎朱颜在，鬓白男翁志未衰”。

1984年2月上旬，我把拙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

---

① 见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1版，第995—997页。

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概要”，寄请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审阅并请他赐序（我和蔡老亦未面识），他在序题为《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的序中，<sup>①</sup>开头便说：

现今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分，再也不好停留于书本上了，不仅要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合，而且要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后面我要说的刘尧汉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他又正确地指出：

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比之书本的材料，是一种未成文的活史料，这种活史料有时要比死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至少也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蔡老在文中末段又说：

现在云南省成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尧汉教授以彝族学者而兼任所长，真庆得人。彝族是我国现在占人口较多数的兄弟民族之一，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有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历史，才能写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中国文化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化专史的基础上，也同于中国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史的基础上，这就不待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

<sup>①</sup> 载《文汇报》1984年4月9日第三版。

蔡老把我与王国维相并提，我不敢当。蔡老十分谦虚，他以年近八旬（1905年11月10日生）的高龄，看了拙著之后，还说他更加不满足于过去书本材料，而期望“趁机补课”。在他给我的信里说，当年（1984年）暑假，他很想往西南山区一游。因身体条件，未能成行。这反映了民族学资料即活史料的价值，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同样，我们从事民族学的人，也要更重视研习其他学科，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1985年3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为我与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所写序言中说：

我们常说，历史学有三重证据：一是文献，一是考古，一是民族调查；第三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是过去历史的重现，是时间的倒转，是转瞬即逝的良机。

他在序言的末段中又指出：

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蔡老和杨老，南北异居，不约而同，对于民族学，各少数民族史、文化史、彝族文化史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成果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其正确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彝族共有545万人口（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居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三回），历来被视为文化落后；因而在文化上的地位，或许是在第四十位之后了。彝族的文化既然落后到这样的地步，我竟然要主编这

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而写书的人多是彝族青年，并未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只是高等院校、大专、中专毕业的青年。

我却认为，能获得硕士、博士的学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干实事；能获得高等院校的文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水平。那么，怎样衡量水平呢？我的浅见是：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我们编的这套丛书预计三十本，除了我和卢央副教授各自写一两本，两人合写两本（共四本）之外，大多数是我指导的青年们写的。写作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史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便是科学论文和专著产生的过程。我就这样带领新战士，走新路子，出新成果，这也是我不拘一格培育中华儿女的新方法，是一项培养人才的大胆试验。

总之，我指导青年的研究方法，是把从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配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多赋有山野味，其中或多或少也杂拌着海味乃至洋味。总之，它们都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如范老所说，其“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因而别有风味；以饷读者和大方之家，请择可口者品尝之；切盼给予鉴定，提出批评！现举21本的提要为例：

## 二、“山野妙龄女郎”群

（1）〔彝族〕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已出版）

中外不少学者如闻一多、周士一、潘启明、莱布尼兹、李约瑟等指出：中国科技文明，主要出自道家、道教及远古伏羲。但他们未明其源头究在何处。拙著旨在究明其源头出自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哀牢山、乌蒙山、凉山彝区原始道教的彝族虎宇宙观，这种原始宗教哲学，由彝族十月太阳历所表达。详见拙著。

(2) [彝族]刘尧汉、[彝族]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已出版)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中国居于末位。历法是衡量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它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它不仅渗透中国文、史、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之前，本书专对此作论证。这为振兴中华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设“四化”的新中国将起振奋作用。

(3) [彝族]刘尧汉、[彝族]卢央《彝族向天坟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的地位》

彝族向天坟是综合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方法的观象台，它在中国考古天文学上是首次发现，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有其独特地位。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特点，是按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春分、秋分等等)来定季节，因此它的季节性很准确。它观察太阳运动定冬夏，北斗柄指向定寒暑。滇、川、黔大量残存的彝族向天坟是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它在中国墓葬方法上独具一格；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里别有特色，美洲土著印第安部落玛雅人金字塔与之相似。

它在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12月下旬，在大雪冰封中，我率领三个彝族青年，首次考察贵州西北乌蒙山威宁县彝区大坟梁子山冈上规模宏伟的彝族古向天坟，时为白雪覆盖，满天阴霾，未能辨明而返。1984年10月2日，我邀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卢央副教授一同率领另两个彝族青年再次考察此向天坟，惜已毁于“文革”中，尚依稀可辨。

1984年11月7日，我率领另三个彝族男女青年，考察了滇西乌蒙山弥渡县与南涧、巍山两彝县毗邻德苴区金古村（曾是彝族）所倚向天坟。11月16日带领这三个彝族青年离云南楚雄彝州赴四川凉山彝州，22日赴金沙江北岸雷波县，23日考察了县城南三公里的一座向天坟和县城东五十多公里的四座向天坟。

金沙江两侧云南、贵州乌蒙山和四川凉山都有彝族向天坟。以贵州威宁盐仓区大坟梁子的向天坟尚保持彝族固有传统，呈现由大渐小的三圆台堆垒形，没有碑记，有台阶自基台、中台而达顶台，上台顶凹陷向天。夜晚埋葬，尸灰置入凹陷处。此墓主名苴穆阿切（又名苴穆直博），约当唐宋之间，为氏族部落首领。以此坟为中心，周围五十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五十座向天坟。四川雷波城南三公里丁丁堡村向天坟，只有一个圆台，没有碑记，墓主为本村杨树森（1984年10月26日病逝，78岁）之父，与曾为雷波土司杨黛蒂同志（女，62岁，现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同为凉山彝族贵族阿卓氏族的成员，且是雷波杨土司的管家。雷波城东五十多公里永盛乡和溪洛米乡各有两座向天坟，都是圆圈，受汉族墓影响，已有碑文，彝汉文对照。后两座向天坟之间有三座汉族坟。这两座彝族向天

文坟，有彝汉文碑记，墓主为彝族阿折（别译“昂折”）氏族，与明代贵州水西宣慰司（治今大方县）同氏族。

向天坟所在山冈均取南北或北南的方向，便于南向观察太阳运动定冬夏、北向观察斗柄指向定寒暑，它综合了彝族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方法。云南哀牢山摩哈苴彝村，作为祖先灵位的葫芦，顶端开口向天；又称“灵台”，即为祖先灵魂所居。三圆台堆垒的向天坟略似将三个葫芦刻成三个圆台形。《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今川东古代巴国（与彝族同属古羌戎）有“灵台”，当即古天文台。《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时尚保留“匏（葫芦）居之台以观国氛”的观象台，其形很可能似哀牢山彝族的葫芦灵台或似贵州堆垒三圆台，有台阶达顶台。

彝族向天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在墓葬结构上独具一格，它兼有古观象台或天文台的作用，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4）〔彝族〕杨和森《图腾层次论——从彝族的图腾层次考察夏、商、周的原生图腾》（已出版）

“图腾”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词，它是用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作为区别氏族的标志和符号。原始人认为，他们的祖先与某种动物、植物有血缘关系。美洲印第安人由许多氏族部落组成，每一个氏族都有他的图腾。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印第安人的图腾一一列举，但从中没有区分出印第安人最早的原生图腾和他们后来因人口增加而产生的演生图腾。“图腾”这一词，由清末严复首次翻译成汉文，介绍到中国。郭沫若首次运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来解释我国夏、商、周的图腾，而夏、商、周又各有许多图腾。由郭沫若开始

直到史学界的名人以及在我国古代史和原始社会史、民族学家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于夏、商、周的图腾各执一说，莫衷一是。这就是由于摩尔根未区分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何者为原生图腾，何者为演生图腾，或再演生图腾，由此而造成的混乱。现在，如果还要从美洲的众多图腾和非洲、澳洲有关图腾的零星记载中，来区分出其图腾层次，已经不可能了。在我国，要从有关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图腾记载中，即从书本上来区分他们的图腾层次，也已经不可能了，或者是从其他少数民族的零星图腾中，去区分其图腾层次，同样也不可能了。只有从四川凉山德昌县的彝族各种图腾；云南楚雄州乌蒙山武定县彝族各种图腾；滇南六诏山新平鲁魁山大寨彝族的各种图腾及滇、川、黔彝族共有的彝族虎图腾，即上述三地较为系统的图腾，可以看出彝族的众多图腾是有层次的，即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其它的图腾是从虎图腾中分衍出来的演生图腾和再演生图腾。用彝族的图腾层次，即彝族的图腾具有原生形态，演生形态和再演生形态，从而表明图腾演化具有层次性，由此可以区分出夏、商、周各具多种图腾中，何者为原生图腾，何者为演生图腾或再演生图腾。藉此可澄清我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在图腾问题上的混乱。由此可见，“图腾层次论”在学术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5）〔彝族〕龙建民《市场起源论——从彝族的“十二兽”纪日集场考察现代市场的起源》（已出版）

当前欧美学者都研究英国利物浦、美国纽约等现代市场的未来，我国学者从本国众多的小城镇出发来研究其发展前景，国内都在向前看，这是顺应世界潮流，而必须如此。本书则是从彝族的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来考察我国小城镇及国内